

政府应全面退出直接招商引资的舞台

郭文婧 律师

各地政府在展示形象、招商引资、推动合作、发展经济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招商中的奢侈之风，也影响极坏。一个香港酒店业从业人士说，招商团入住的基本上都是最高档的酒店，普通标准间都要2000元左右一晚；今年5月，某省招商团的一顿早餐会就花费约4万元，人均1000元。（8月26日《人民日报》）

客观地说，政府官员奢侈腐败是一回事，招商引资又是另一回事，两者无必然因果关系。但现实中，公费旅游、奢侈消费、津补贴奖金等很多腐败又都是假“招商引资”之名进行的，穿插其中的还有若干行贿受贿、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犯罪行为。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政府不直接参与、特别是不再统包统揽招商引资，

政府官员的奢侈腐败是不是会少一些？招商引资很必要、很重要，但除了政府直接做之外，究竟还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

从政府的职能来说，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核心职能，招商引资即使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也并不是核心。从经济本质来讲，招商引资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市场行为，理应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基本都已经退出了直接招商引资，基本上都是以企业为主体、以中介为龙头进行，政府主要负责指导和服务。因此，政府不再直接招商引资，而是专心管理服务，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历程较短，在市场主体还没有充分发育起来之前，政府直接招商引资既是现实需要，更是无奈选择。但问题是，政府不仅没有随着市场主体的发育

而逐渐退出，反而在路径依赖之下更加强化，定指标、压任务、全民招商引资，地方跑省会、大中城市跑“部”，西部跑沿海，中部跑长三角，长三角跑珠三角，穷一点的跑港澳台，有钱一点的跑美国欧洲……各地各级党政领导穿梭来往，一派繁忙。最终的结果，是少数升了官，多数进了医院，部分进了监狱。

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在为促进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带来的负面问题也越来越多。如果说随之而生的官员奢侈腐败现象，只是官员个人修养的问题，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问题，就与这种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脱不了干系了。一是教育、司法、民政等本不应该承担招商引资任务的部门，在考核压力之下，不得不“荒了自己的田去种别人的地”；二是政府注重为招商引资而来的企业服务，开绿灯，却忽视平等服务与公平竞争，结果“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

子”；三是造成政府职能扭曲，机构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繁重，大家都忙在招商引资上面，结果政府机构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频出。

时代不一样了，我国的各类市场主体基本上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而且在如今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信息社会，政府招商引资的优势也越来越小。各国政府发展的趋势，也都已经开始由无所不包的全能管制型政府向更加灵巧的专业服务型政府转变。正因为如此，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反复强调要进行“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转变职能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近年来，上海、北京、深圳等市场经济

较为发达的城市，已经开始探讨由企业集团、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为主体的招商引资新机制。在2002年，上海市政府就表示要逐步退出招商引资；在2007年，上海浦东新区12个街道办事处表示正在全面退出直接招商引资的舞台。实际上，对大多数地方来说，目前政府退出直接招商引资舞台的时机，都已经成熟了，只是思维惯性、制度惯性、扭曲的政绩观以及既得利益的路径依赖，让大多地方政府不愿意选择退出。

面对不断曝光的招商引资丑闻，光靠严厉查处，作用必然十分有限，只有釜底抽薪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是时候了，政府应该主动选择退出直接招商引资的舞台，将工作重心放到推动法制完善、依法行政上来，尽可能提供公共服务、补足公共物品、调节收入差距，制止市场失灵，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戏画闲言

虚假广告：明星代言须“连坐”

吴之如·文井画

《新京报》报道，针对大量虚假广告充斥电视频道、明星代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初审稿与二审稿均强化了虚假广告发布者的连带责任。

明星代言产品广告，扩大了商品知名度，对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颇有好处。同时，代言广告也成了明星们“先富起来”的一个重要途径，实现了名气与金钱的转换，为这个社会增添了诸多亿万富翁富豪。假如这一切活动都依法循章进行，不但政府乐观其成，百姓们一般也不会眼红。

问题在于，有些不法商家不惜巨资请来明星，为他们的伪劣产品大做虚假广

告。明星当然不乏有见识有骨气有良心的明白人，坚决拒绝为商家的伪劣产品做嫁衣裳；但也确有相当部分人看在大笔金钱的面子上，稀里糊涂地或者假装糊涂地乐于承接这类不实广告，以自己的形象和名气，为不法厂商的虚假面具涂抹着脂粉和光彩。说他们是奸商们欺骗广大消费者的帮凶，也并不为过。

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稿强化了虚假广告发布者的连带责任，无疑为所有愿意替商家做产品广告的明星们敲响了警钟：接广告时，请睁开眼睛看个仔细，辨清真假伪劣后再作决定，不能再不问青红皂白有钱赚就行了。有道是：

明星代言须“连坐”，虚假广告岂香饽？遵守法规求实在，钱欲膨胀易入魔。

对于消费者来说，有关明星做虚假广告要负连带责任的规定，则是一个利好消息。此举，肯定会大大减少明星吹捧伪劣产品的乱象，而令市场秩序趋向正常。



首例“污染环境罪”开启环保法治时代

王捷 职员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污染环境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以污染环境罪，对南京荣欣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毓勇等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据了解，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江苏首例受理并以此罪名作出判决的环保刑事案件。（8月27日《法制日报》）

污染环境被判刑，是首次，也是一声强力警钟，它敲响了非法排污丧钟，意义非凡。对百姓而言，保护环境有判例遵循，有了底气。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威慑力的警示，有了畏惧。企业如果再不把排污问题解决好，法律的利剑该出手时就会出手，毫不犹豫的把非法排污的相关责任人或企业负责人斩于马下，同时，还要被判巨额罚金。企业主或相关负责人是愿意蹲大牢和被罚款，还是愿意主动解决

好排污呢？企业要好好掂量。

说判例意义非凡，因为当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一些环境污染事件令人不寒而栗，保护环境刻不容缓。比如，近日，在湖南益阳柘溪，水库天3死50万斤鱼；2010年，在陕西省大荔县苏村乡苏村，无良企业靠渗漏处理污水，污染地下水，村民每天用于做饭的水抽上来是黄色的，有媒体称之为“致命威胁”；2012年，在广西，企业将污水直排地下溶洞，导致龙江河被镉污染。

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近年来，一个关于“中国癌症村分布图”的消息不脛而走。据资料显示，有197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已确认，有2处分别描述为10多个村庄和20多个村庄，还有9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据估计，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2013年2月21日《凤凰周刊》）。

“癌症村”的背后直指环境污染。据《江南时报》2004年报道，在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报道，在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新岗村，因为环境污染，最近七八年，该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据《江南都市报》2004年报道，在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横溪垦殖场，因为化工厂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

由此看来，环境污染是人类的“致命威胁”，丝毫不夸张，保护环境迫在眉睫、任重而道远。这次，江苏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启动法律利剑，把污染环境的“害人虫”绳之以法，真正开启了保护环境的强有力的法治时代。各地应该以此为判例，牢牢握紧保护环境的法律武器，剑指非法排污和环境污染，用法治保护好环境，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为子孙后代留下碧水蓝天。

况且，保护环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有丝毫懈怠，否则就是对人民和对历史犯罪。

企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陈锦石 企业家

对任何企业来说，唯利是图，逃避责任，都是目光短浅之举，终将难成大器；过度解读，好大喜功，则会使企业负担沉重，难以后继。唯有全面理解，辩证分析，才能有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此，笔者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

笔者所理解的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企业奉公守法，正常经营，如提供充分就业、按时交纳纳税款等；第二个层次是勇于付出，敢于承担，如扶贫济困，进行社会捐助等；第三个层次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始终牢记搞好企业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有句名言：企业首先得做好，然后才是做好事。一个企业，如果连生存和发展都成问题，何谈社会责任？只有努力提高企业效益，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腾出财力物力扶贫济困，回报社会。笔者所在的中南集团创建于1988年，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超690亿元、综合产值350亿元的大型上市集团，为国内知名城市综合运营商，是南通地区纳税排头兵。在吸纳就业方面，中南积极响应国家“保民生、保稳定、关键是保就业”的号召，先后为社会提供5万多个就业岗位。2008年金融危机，中南逆流而上主动接收应届毕业生200多

人，被称为最难就业年的2013年，集团仍然接收应届毕业生800多人。在员工待遇方面，无论是基层工人还是设计师，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普通管理者，中南都确保人均收入年年提高，福利待遇绝不含糊。目前，中南工人人均年收入达44万元，管理人员人均年收入达9.5万元。近年来，集团还先后通过购股、配股、期权等多种形式，打造企业与个人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说，中南真正实现了与员工共成长、同进步。

把回馈社会融入到企业发展中去。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中南集团成立25年来，始终秉承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父实业、母教育”的理念，坚持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回馈社会、造福民生，重点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特别关注教育事业发展。中南集团的善举史，从汶川大地震到台湾莫拉克台风，从云贵高原旱灾到雅安地震，中南集团都第一时间出人出力到现场慰问、捐款赠物，给需要帮助的人们送上一份温暖。从投资兴建家乡幼儿园、中小学到在云贵川地区援建学校、援助失学儿童，中南集团从来都是慷慨解囊，全力以赴。2010年以来，集团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慈善企业”。目前，中南集团在公益事业上已累计投入逾3亿元，成为本地捐款数额最大的企业。2011年5月，为使中南集团的社会公益投入做到科学规划，有序管理和长效发展，中南集团还顺应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的需要，专门规划两亿元专项资金，成立“江苏中南慈善基金会”，实现了中南集团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和专业化发展。

可持续发展与节约资源同样需要企业有担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是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绝不能只算经济账，一定要高瞻远瞩，站在全局的立场上，坚持可持续发展，下决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此，早在2007年，中南集团就针对国内建筑行业施工技术落后、耗能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的现状，在引进澳大利亚技术并参照日本抗震技术基础上，通过多年时间的科研，消化吸收和生产实践，形成了自身核心竞争力——NPC建筑技术，使得“象搭积木一样造房子”成为现实，2009年率先在海门中南世纪城33号楼成功试点。该项技术先后获4项国家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并获“江苏省建设科学技术一等奖”。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NPC建筑在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境保护方面有着传统施工工艺无法比拟的优势，工期缩短三分之一，耗水量减少63%，木模板使用量减少87%，垃圾产生量减少91%。目前，中南正举全集团之力，行非常之举，全力以赴推进建筑工业化进程，力争到2015年NPC建筑产值达20亿元，确保在国内住宅产业化新兴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十年内在江苏省内全面推广。

期待“营改增”产生宏大而深远的影响

黄梹梓 公务员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8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谈到下一步工作安排时，楼继伟表示，将继续深入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加快营改增、消费税、房产税以及资源税等重点税种改革。（8月29日《上海证券报》）

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营改增”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和“引擎”。笔者认为在多项税收改革中，“营改增”应该处于领先地位。继2012年1月1日上海市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试点之后，2012年8月1日至年底，“营改增”试点范围又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等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从今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开始推向全国。楼继伟部长表示下一步将抓紧研究制定铁路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的“营改增”试点方案。“营改增”必将推向更多的行业，最终以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

营业税作为现行税制下地方税的一个主体税种逐渐消失，必然促使中央与地方财税利益分配的调整乃至各方面改革的深化。有专家分析认为：从宏观经济运行视角看，“营改增”不仅是完善现行流转税制的基础性举措，而且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以及关系新一轮宏观调控成败的重要操作。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视角看，“营改增”既可能催生地方主体税种和地方税体系的重建，也可能催生直接税体系建设的提速；

既可能倒逼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构，也可能倒逼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在内的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启动。可见，“营改增”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产生宏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房价反弹的压力增大，房产税改革的风声又起。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双双提到“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这已经是高层第N次提到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了。为何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不能像“营改增”扩围这么能够紧锣密鼓地迅速推进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时机尚不太成熟，房产税改革的大面积扩围还有赖于将“营改增”扩围推向纵深，如果“营改增”覆盖到了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旧的财税格局也就被打破，这才为改变我国间接税与直接税比例严重失衡的格局、重建地方税体系等提供契机，房产税作为具有财产税性质的直接税，将成为一个新的地方税种受到地方政府重视，地方政府才会有更高的积极性将其纳入地方税体系建设之中。

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不仅有可能产生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释放房产市场有效需求，缓解供需矛盾，避免房价过快上涨，并且逐步挤出经济泡沫，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效应，也有可能倒逼房产信息系统的全面建立和联网查询，进而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建立。这也许就是专家所论及的“营改增”倒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现实及深远的意义所在，也正是社会公众的期望所在。

医疗资源分配本不宜“让一部分先富起来”

武洁 医生

8月26日，微博实名认证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的章蓉娅就积极配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微博上向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了一条“实名建议”：取消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该建议迅速引起热议。此前，不少地方豪华的干部病房被曝光。而新华社在调查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时发现，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而山西某三甲医院副院长表示，“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中科院报告称政府医疗投入80%为党政干部服务。（《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7日）

这边厢，“患者看病如打仗，排了长队，仍然未必挂得上号”，那边厢，却是“干部一次住院花费高达300万”，甚至不乏公立医院的豪华特需病房被一些干部长期当成宾馆住。两相对比，医疗资源分配中的厚此薄彼，的确是令人怵目惊心。

乍一看来，病房的归病房，门诊的归门诊，干部们占着豪华病房，似乎并未碍着普通患者们挂号。看病难这事儿，似乎无论如何也怪不到住院干部的头上。更何况，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干部而言，当然也不例外，至于“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既然干部们有这样的医疗待遇和资格，要说也没理由不让入去享受。

不过，在整体医疗资源还相当有限，甚至供不应求的前提下，部分群体享有过度的医疗权利，占有过多的医疗资源，其实必然意味着对普通患者医疗权利的挤占，被特需医疗占去大半的医疗资源，也

就不得不面临更激烈的拼抢与争夺。从这个意义上说，干部把病房当宾馆住，与普通公众挂不上号之间，恰恰存在着因果关系。由于医疗资源分配的厚此薄彼，而导致医疗资源愈发的捉襟见肘，也就未尝不是导致当下“挂号难、看病难”现象的又一重要因素。而这一点，从官员竟然需要“暗访”才能体验到“看病难”，也再次被佐证。

同样的医院，却仅仅因为患者身份的不同，而有着天壤之别的待遇。尽管在市场化社会，商业服务当然可以按价下菜，但对于公共医疗资源而言，这样的厚此薄彼，即便有其历史上的成因，也绝非长期延续下去的理由。而据中科院报告，政府医疗投入中的80%为党政干部服务，小部分群体却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公立医疗投入，医疗资源分配上所呈现的“二八定律”，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尤其是当干部的公费医疗待遇，往往还是近乎免费的午餐，不用白不用的“公费医疗”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浪费和过度使用的现象，甚至成为医疗服务体系中最为核心的负担。只不过“免费午餐”其实从来不是真正免费，干部们能把病房当宾馆住，不仅意味着公共财政将为此而支付真金白银，也更意味着对医疗投入的滥用，并让紧俏的医疗资源愈发的雪上加霜。

与经济发展可以选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径不同，公立医疗资源，却更应优先确保其公平和高正性，而绝无当理让一部分人优先享有高待遇。尤其是当医疗投入仍捉襟见肘，医疗资源还有诸多缺口的情形下，更不宜让有限的资源被少部分群体过度占据。而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原则，也更应该有助于整体社会的公平，而不是加剧其中的不公。